

## 乌托邦的理论局限及其超越〔\*〕

○ 孟宪平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化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在人类思想史上,乌托邦既饱受诟病又多有殊荣,围绕未来目标的可能性及现实性问题,思想者和研究者各有说辞。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并使人站在现实的此岸遥注未来的彼岸,通过超越物理边界、心理边界和存在边界而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认识乌托邦,要判断哪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哪些方面具有消极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超越了乌托邦思想的局限性,摆脱了虚幻色彩和空洞的说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指导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8.016

乌托邦思想源远流长,在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列宁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说:“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 20 世纪初,这个阶级已经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sup>〔1〕</sup>今天,重新审视乌托邦,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

### 一、乌托邦的想象:虚幻的还是真实的

乌托邦思想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不管是积极的

---

作者简介:孟宪平(1968—),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商丘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上思想文化阵地的型构模式及建构方式研究”(18BKS118)、“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15 年度资助研究项目成果”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15WTA02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还是消极的。它是对现实问题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真实特征;它是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臆想,因而具有空想特征。正如许多社会批判家在自己的理论构建中总是要提出一种出路或办法一样,乌托邦也体现出这种理论抱负和济世情怀。

### (一)带有唯物成分而又充满唯心色彩的认识

任何伟大思想的起源都可以从历史的深处追溯,任何乌托邦思想都与那个时代的发展有关。15世纪前后,关于世界的辩证认识在英国的唯物主义那里有了很大发展,对物质运动的认识在宏观上和微观上也都有很大飞跃,充满活力的认识成果体现在归纳、分析、比较等认识活动和实验活动中,天体论、原子论、生物进化论不仅对宗教圣物和神学观念提出挑战,也在人们面前展示出光明前景。尽管这时的唯物主义很少涉及社会进化方面的问题,还未能对历史发展做出客观的解释,“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sup>[2]</sup>直观感觉基础上的诗情画意的消逝,使禁欲主义色彩浓厚了,感性之物变为理性之物,概念和观念成了“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那个时候,学术发展要命名和解释这些幻影,思想认识要借助这些幻影来体现,这样的情况下,“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实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sup>[3]</sup>。不同形式的乌托邦,可能带有神学意识、英雄史观或主观色彩,它是历史的产物又具有幻想特征,它是现实的反映又包括空想成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从最原始最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解释,是对不可知论的新奇回应,他们朦胧地意识了社会的进化发展功能并以猜想的方式将有关认识描绘出来,虽然形式光怪陆离,语言荒诞不经,却以“天才思想”激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都不完全是虚无缥缈的。从哲学的批判精神看,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色彩有别于不可知论的神秘形式,它的挑战性在于宣誓人类社会发展是充满主观意志的客观进程。也就是说,这种乌托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思想和活动。理论和实际也许只有一步之隔,也许相差很远,前一种情况容易统一,后一种情况很难协调,“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整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sup>[4]</sup>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与内心的逻辑总结,尽管不是天然的不一致,但却经常带有明显错位,因此有关理论中难免会有空想色彩,但如果以这种空想色彩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也不是辩证的观点。

### (二)带有社会印记而又充满虚幻说教的愿望

乌托邦的想象与宗教神学及其发展历程有很大关系,而当人们的思想由现实转向神灵时,虚幻就成为必然。“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

从它的丰富宝藏中得到一点东西。”<sup>[5]</sup>这种迂回的方式是想通过“某种超验性的力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由此人们便将自己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虚幻关系，自己的心灵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意识到，“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sup>[6]</sup>这个想象出来的异己对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于无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义式的偶像。当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未来寄托于宗教神学时，“空虚早已存在，因为宗教是使人自我空虚的行为”<sup>[7]</sup>。在宗教迷雾的笼罩下，“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达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sup>[8]</sup>一些时候，它所标榜的慈悲情怀并不是和谐地表达的，它所宣称的济世妙语也不是文明地叙说的。这种状态，正如列宁描述的托尔斯泰文学中的矛盾一样，“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sup>[9]</sup>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方面，统治阶级和宗教派别是煞费心思的，他们认为：“天国感到高兴的并不是诗人的诞生，而是误入歧途者的觉醒”<sup>[10]</sup>。宗教很虚幻，却总是把自己打扮的很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洗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sup>[11]</sup>剥削阶级不遗余力地通过宗教表达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奴隶、农奴或工人做温顺的听话者，宗教成了安慰他们的思想蓝本。但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却选择了另一种想象：“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sup>[12]</sup>两种思维，两种方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德国市民社会是在时代精神引领下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但包含着天才预见的“千年王国”并没有摆脱宗教影响。

### （三）带有理性关怀而又充满非理性内容的想象

乌托邦的历史性及空想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联系最为紧密，其社会信念之中充满了启蒙主义者的乐观精神。“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sup>[13]</sup>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在受压迫受雇佣的状态下朦胧地感受到了改变自身地位的重要和必要，他们在思想上倾向和同情社会主义运动。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判断也使空想社会主义带有历史痕迹和现实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联系图景和生产关系模式下，整个历史

呈现出不断向前最终趋于完善的目的论倾向。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伪善和虚幻并不少见,不仅需要无产阶级理论家辩证解读它,更需要工人阶级现实地对待它。“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sup>[14]</sup>在道德与幻想基础上,人们仿佛看到了通往终极目标的前景,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理性的动力和作为历史进步标志的道德风尚,成为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多邪恶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理性之光照临世界时,“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就不承认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以及愚蠢而虚伪的工具,除了在历史的舞台之上而外就将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而外,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扼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们胆敢一旦卷土重来。”<sup>[15]</sup>空想社会主义希望用理性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愚昧和奴役,这种想象也宣告了一种虚无主义形式的降临,它用一种迹象倾诉心声,激励人们奔向设想的未来目标。“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sup>[16]</sup>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为资本主义宣读祭文,是不符合实际的;通过特殊阶层的“解放”诉求改变不了工人被压迫的命运,理性王国所需要的解放逻辑与现实的社会愿望并不统一。平心而论,谴责资本主义世界的虚假,无疑会增强人们对这个社会本质的认识。但是,脱离具体环境设想一个“现实的社会”来取代旧社会,在否定感性中的现实世界的同时虚构了一个现实世界之上的“真正世界”,在生活的彼岸寻找栖息之所,也叩开了虚无主义之门。这样的思想中,本来希望把人们引向解放的思想逻辑,却把人引向虚无之路;本来希望给人的发展设计理想蓝图,却将虚无的设想推向高峰,这种“理性化的无稽”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从头脑中寻找变革社会的动因,从有关时代的哲学寻找变革社会的动因。

## 二、乌托邦的内容: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对于乌托邦,完全视为空想或虚幻不符合实际,但把所有的方面都奉为圭臬也必然会出现差谬。借用布洛赫的概念,可以将那些通过努力变为现实的内容称为具体乌托邦,而把那些难以企及的愿望称为抽象乌托邦。如果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做一分类,则可以有基于神学思想的想象、基于纯粹思辨的想象和基于现实的想象,它们分别表现为由命运支配的神人合一目标,思维支配的心物合一目标以及他者支配的人我合一目标。乌托邦的冲动具有两面性,可以是陈腐不堪的将人引向虚无的白日梦,也可以是斗志昂扬的创造新世界的白日梦,可以是祛魅和解蔽的动力,也可以是引起迷雾和困惑的酵母;可以把思想与现实缝合起来,也可以将希望转为失望。乌托邦既不是现实的“存在”,也不是脱离现实的“本质”,它表达的是人的本质与人的现实之间的张力状况以及缓冲这种张力的意向,它不应被视

为理论归宿而应是叙事的起点。拿莫尔的《乌托邦》来说,其中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描述,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理想国度,不少方面是对当时社会的现实出路所做的对策性描述。共产主义思想也曾被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的理论家说成是乌托邦,《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初,欧洲的统治者及其拥护者惊呼“幽灵”的出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戒备之心从来没有减弱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蕴含巨大能量的“幽灵”理论,一旦在社会中蔓延传播,终将炸毁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幽灵”的壮大与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正确的而不是乌托邦。从1848年这个“幽灵”的出场,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幽灵”变为“现实”,一个活生生的事物从欧洲走到了亚洲和全世界,体现了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联合,而反对阶级却把它列入空想之列,但当社会主义的曙光在欧洲以及更大范围显示光芒时,支持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事实表明,一些乌托邦的想法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其空想特征的,抽象的内容也可以转化为具体内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种“抽象”和“具体”也不是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名词,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内容。马克思主义把未来的期盼建立在对现实的认识基础上,包含着超越乌托邦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希望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实现无产阶级的愿望,这不只是思想愿望的表达,也是以实际行动走向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的表现,那种“只听钟声而不知钟声何处而来”的心境,是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真谛的。列宁认为:“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并认为“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sup>[17]</sup>这是就乌托邦本身的结构和前景而言的。在当时的俄国,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也都是幻想和软弱性的产物,它们在群众中的负面影响又是不能忽视的。“自由派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表现。”<sup>[18]</sup>对这种充满虚幻的乌托邦要具体地看待,“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sup>[19]</sup>在列宁看来,民粹派的民主主义是在历史进程中由积极方面转向消极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sup>[20]</sup>

对乌托邦的内容予以甄别,需要认识哪些是积极的和有益的,哪些是消极的和有害的。“积极”与“消极”的判识标准在于能否合理地把握今朝和预见未来,让人们学会希望,并且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绝望,这必然是积极的思想。关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不能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也不能完全认定在当下没有经验证明的就是无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形态的预测,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

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这也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乌托邦的基本理路。“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sup>[21]</sup>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上的科学性、理论上的前瞻性以及实践上的革命性。“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sup>[22]</sup>从历史根据和现实社会中寻找未来社会发展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是积极追寻历史脚步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说，思想的魅力就在于经常性的存在着尚未实现的而又令人向往的东西，如果其中的内容很容易实现，那么这种理论会因为浅显直白而减损其吸引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有过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用上电冰箱”“土豆烧牛肉”“人人都能欣赏艺术”等作为共产主义目标的做法，这种“红色市侩”难免会降低共产主义的格调和品位。

从理论和现实方面重新审视乌托邦问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希望，理性就不会开花；没有理性，希望就无法说话，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当中——没有其他科学拥有未来，也没有其他未来是科学的。”<sup>[23]</sup>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着理性的“冷流”和希望的“暖流”，其所论证的自由王国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梦想。重新审视乌托邦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科学认识中国梦的伟大前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切实把这种意识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付诸实践。马克思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说：“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sup>[24]</sup>我们现在讲实现中国梦，它不应该是沉滞的知识，而应该是行动的指南。作为一种思想愿望，科学社会主义经常面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诋毁和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质疑，他们都可能会窒息美好愿望的动员功能，甚至阻碍着它的实践历程。重新审视乌托邦问题的重要目的还在于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目标，人类历史总是处在上升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长的道路，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具有鼓励群众意志的作用，那种因为道阻且长而降低共产主义水准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标还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和理想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我们没有理由淡化它的功能和前景。在思想多

元和价值多元的今天,不良意识试图摧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掌握历史和认识世界的意志和毅力,我们必须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和鼓舞人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sup>[25]</sup>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人们的社会理想逐步接近和符合现实,我们今天的中国梦也是在思想与现实的继承中创新发展的。

### 三、乌托邦的维度:有界的还是无界的

乌托邦思想有没有边界?如有,这个边界在哪里?如无,是不是意味着漫无目标?有研究者提出了带有乐观主义的“辩证乌托邦”思想,并认为:“以莫尔为代表的传统乌托邦思想,具有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并行的结构,他们都是固定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思想,这种空间乌托邦常常受到社会过程的冲击而失败,而黑格尔、斯密所持有的都是一种‘无地点的’过程乌托邦,这种过程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的(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点。”<sup>[26]</sup>总体上看,乌托邦的界限可以从物理状态、心理状态、活动状态和发展状态等方面来认识。

#### (一)乌托邦的存在维度及其超越

任何乌托邦的设想都离不开对人的生存维度的关注,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国度的人们都对生存范围怀有拓展的欲望,他们看到了自然空间对于人类生存的决定作用。这种生存边界的开拓始终是很多国家的人们的内心渴望。康德有一段论述讲到物理边界的激励作用:“现在我们已经不只勘察过纯粹知性的疆土,小心调查过它的每一部分,而且还测量过它的范围,使它里面的一切都各归其应有的地位了。这个领土是一个海岛,自然把它包围在不可移动的界限里。它是真理的故乡——好一个迷人的名称!——周围是广阔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即幻想的本土,其中无数海市蜃楼,作为迷人的远岸出现,在诱惑冒险的海洋家,虽然终都成为空想,但总是叫他们从事于欲罢不能、仰之弥高的事业。”<sup>[27]</sup>在有了固定的活动边界后,人们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思想回应和探索,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up>[28]</sup>由此看来,任何乌托邦的形式不外是现实基础上产生的特定观念,即使是通过海外奇谈、天方夜谭、理想国度的述说,都是现实活动基础上的想象延伸。由物理边界影响的认识边界,造成了乌托邦想象的基本原型,这种想象不是天马行空和随意驰骋的,它的素材就在现实之中。但此种乌托邦一经产生,就有可能摆脱物理边界而形成无边界的想象形式,就像神鬼是人创造的但又在思想上支配或影响人一样,乌托邦这种由人创造的有限的东西却成了具有无限支配性的思想。任何乌托邦思想一旦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被时空化的方式解构,如

何用这个乌托邦理想来统合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如何更加辩证地表达现实的矛盾问题,毋宁说是乌托邦理论面临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主体面对的问题。神学乌托邦给人以精神上的束缚或慰藉,生活在现实中的信徒祈祷在天国在来世解脱一切苦厄,这是期待从有界的生活向无界的存在飞升,但上帝语言的虚幻性、天国的空灵性难以带来理想的东西。中国古代社会设想的大同世界,希望从鸡犬相闻、小国寡民的现实边界走向四海升平、天下一家的无界形式。中国传统社会的“入世”与“经世”是一种模糊的边界,在行为上希望“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依靠“学而优则仕”诠释现实,当求之不得或官场失意时,又会以去边界化的形式归隐他处,他们对“人的本质”“人的标准”所做的“完美”设定,带有明显的乌托邦韵味。社会在转型,思想在变迁,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发生的变化,经常给物理边界打上意识印记,在技术和思想瞩目中不断改变着人类存在的维度。

## (二)乌托邦的思想维度及其超越

对未来社会的探索是激动人心的事情,把它视为“站在门口的虚无主义”不符实际,古代西方的“解放逻辑”是把“世界图像化的”思想形式,此岸的“自我”与彼岸的“自我”难以统一起来的。这种“人”“我”差别造成的思想悬隔设定了不同的边界,而不突破这种差异,社会行为的一致性就无法实现,关于未来世界的梦想就是虚无的神话。就积极方面而言,乌托邦的“理论逻辑”在于通过人的一致行动能够达到所设定对未来愿望并带来看得见的或感受到的好处,使人认识到这一思想的优越性;乌托邦的“历史意识”在于通过历史事实展望和延伸未来愿景,使人感受到它的魅力;乌托邦的“心理谋划”在于以一种迹象倾诉自己,以一种姿态舒缓心中磨难和紧张。因此在心理想象上,乌托邦设定的前景是无限的。正是由于这种希望包罗他者的意向造成了不同的张力和矛盾,思想维度的不同形成了精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差别。在不同的言说中,都说自身广大,到底哪一个更广大?都说自身美好,到底哪一个更美好?这需要通过比较来回答。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意识形态载体,既具有现实的威力又树立了一个虚假偶像,其中作为社会主体的“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sup>[29]</sup>。资产阶级以其欺骗性目的将虚假意识形态发挥到极致,它的关于全人类解放的虚幻的神话没有跳出让大多数人免于疾苦的困境。“在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穿着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话语,不过是一种以普遍性为名出现、实质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立场的‘意识形态’,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sup>[30]</sup>空想社会主义试图以“理性工具”拆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藩篱,但那种借助英雄人物破除迷误并建立永久的道德世界的想法终究不免镜花水月。“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sup>[31]</sup>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设想建立在新的“解放逻辑”之上,是在揭露资本主义虚假性和虚无性的基础上对人的发展做



出的规划。“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生产力。”<sup>[32]</sup> 随着绝对观念的动摇与人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会产生较为强烈的自信意识,进而以其能动性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 (三) 乌托邦的发展维度及其超越

人的解放的边界最终要由实践状况决定。实践可以消除一切僵化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陈旧的生产关系以及象征旧式边界的等级制度。马丁·路德对于金钱“落进钱柜叮铛一响的时候,他死去的亲属的灵魂马上从炼狱飞进天堂”的说教异常愤怒,他反对罗马教皇和帝国政府对人们信仰的粗暴干涉,公开喊出“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sup>[33]</sup> 路德用信念上的奴役制战胜了现实的奴役制,用心灵的枷锁代替了肉体上的枷锁。但是,这种宗教改革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能真正解决问题,它把世俗人与僧侣的斗争问题转化为僧侣内心的问题,他所涉及的上帝、天国却虚幻至极。“如果说新教把德国世俗人转变为僧侣,就是解放了世俗教皇,王公及其一伙即特权者和庸人,那么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这就是解放人民。”<sup>[34]</sup> 回旋于具体与抽象之间,徘徊于理想与幻想之间,这种宗教改革没有真正地消除其虚幻本质。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认为:“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实现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从现在起必须在言论和文字上加以大力宣扬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我要在这个制度清楚阐明的思想。”<sup>[35]</sup> 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出路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目标的虚设。“这种无法估量的力量,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会减少到最低限度”<sup>[36]</sup>,它不仅意味着精神边界的重塑,也要求思想空间上的拓展,对于养成“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恩格斯将人的解放描述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给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多样性的型构方式,其存在形式包括“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自然的主人”的力量体现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是以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为前提的超越物理边界的能力;“社会的主人”力量体现在对社会结构的改造上,是以提升社会协调效能为基础的超越集体边界的能力;“自身的主人”力量体现在促进个人身心的理性发展,是以心智完善为目标的。主体存在的空间边界是反映人的解放的基本尺度,马克思描述的人的发展阶段表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活动空间的依存度是不一样的。要想在人的边界关系上找一个明确的分野,以便将每一个人都划分为有明显界限的单个的人越来越不可能,“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sup>[37]</sup>。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个性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启蒙时期的个性呼声,都曾是冲破旧边界确立新边界的活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

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38]</sup> 思想自由的确立与个性自由的确立互相映照,使未来社会中充满生机而又令人期待,社会的无序的混乱边界将会被规整有序,对时代错乱的有效整治成为可能,政治权威的边界也会被重整。

### 注释:

- [1][17][18][19][2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297、299、300、301页。
- [2][3][4][16][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3、504、506—507、526、560页。
- [5][6][7][33][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7、521、518、208、208页。
- [8][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引言第3页。
- [9]《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3页。
- [12]《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 [14][31][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64、35页。
- [15][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82页。
- [2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8页。
- [23]转引自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 [25][29][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287、87页。
- [26]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页。
- [2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 [30]贺来:《边界意识与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 [35][德]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92页。
-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